

◎西方文化大众精品书系◎

死的历史扣人心弦——解读死亡的密码

La mort et l'Occident de 1300 à nos jours

死亡文化史

用插图诠释 1300 年以来死亡文化的历史

〔法〕米歇尔·沃维尔 著 高凌瀚 蔡锦涛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西方文化大众精品书系◎

La mort et l'Occident
de
1300 à nos jours

死亡文化史

用插图诠释 1300 年以来死亡文化的历史

[法] 米歇尔·沃维尔 著 高凌瀚 蔡锦涛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文化史:用插图诠释 1300 年以来死亡文化的历史/[法]沃维尔著;高凌瀚,蔡锦涛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朗朗书房·西方文化大众精品书系)

ISBN 7-300-05486-2/J·129

I.死…

II.①沃…②高…③蔡…

III.死亡—文化史—研究

IV.B0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4137 号



西方文化大众精品书系

死亡文化史——用插图诠释 1300 年以来死亡文化的历史

[法]米歇尔·沃维尔 著

高凌瀚 蔡锦涛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82501766(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50.75 插页 2

字 数 674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239(出版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死亡研究近况：

新版序言

我不止一次听到《死亡文化史》没有结论的意见。这是作者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过程后疲惫不堪的结果，还是研究者蓄意为读者留下空间，让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和他与死亡和终局的个人关系出发对假设进行思考而得出结论呢？在我看来，所以拒绝任何权威性结论的原因如同一位古典时期闪烁着智慧光芒的作者所说的：“这里不可冒失。”大家可以猜想到，我是倾向于第二种假设的。我可以证明的，是在20年前我撰写了结论，但至今仍为自己所保留。

我无意在此公开。但是作为对今天又增添了许多新成果的调研，我应当做的不是对基本脉络进行更新，因为我希望原文基本上还保留着参考的价值，而是对参考书目进行补充，以反映到这个2000年的世纪之交时刻的研究状况，将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最近25年的成就上。在我的著作结束时提出了“今日的死”的图像，在一个与数百年进展相比似乎相当短促的时间内，这幅图像是否有变化呢？在20世纪70年代末，必然要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这使我想起了使我们受益匪浅的菲利普·阿里埃斯与我的友好谈话，那是在写完了集体感知中《死的再发现》的时候。来自四面八方（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等）的大量文字材料提供了模糊不清的信息，甚至在实践上（或是在解构上），“禁忌”模式似乎在加强，而不是削弱。菲利普·阿里埃斯可以心安理得地（如果我没有歪曲他的思想）看到集体话语的重振是一种延续现象而不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而我希望的是由未来予以证实或否定。

我是否有充分的时间在记载逐日的历史所提供的迹象中去发现有意义的变化呢？这些迹象虽然很丰富，但是沾染了捉摸不定的因素，因此经常是自相矛盾的，带有日常历史引发的主观性。所以我在勾画当前对死亡的感知和实践中的



所看到的惯性和新意时表现出小心谨慎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说对于从 1965 年到 1975 年，或者 1980 年（大概时间）这一段时间的再发现效应或打破沉默效应在今天已经减弱，对于临终主题的兴趣并不因此失去了领先的地位。可以援引的流行效应，如在 1968 年之后风起云涌的节日活动，今天已经悄悄地出了纪念的范畴之外，如果我用点带讽刺的幽默，可以说，在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文献中，死亡的“情况不坏”。昨天还是趾高气扬甚至独霸一切的思想史，今天受到了质疑，或简单地为图景所替代，其认识论角度的变化完全没有导致放弃进行多科性的综合研究的学科领地。

但是，如果至少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历史研究的领域，或是更广泛地在科学领域，这种研究通过自发的运动而具有持续性，其覆盖面已经确定，并不断丰富，在我看来，在文字中对死的兴趣，又被媒体如报纸、电视给予更大程度的关注，是今天可以称之为社会需求的规模的表现。我们已经走出了死的再发现阶段，死的方方面面反映了一个已经不能逃避的社会问题。

沉默的禁令解除了：当报纸上一段简讯（1999 年 5 月 21 日《世界报》）告诉我们“英国的小学生不久将上关于死亡的课程，在课上，他们可以同殡仪馆的代表、医生、护士交谈，参加模仿他们的家长遭遇车祸的游戏”的时候，是否还可以谈论禁忌呢？

虽然我不想赋予我个人的有限经验过多的分量，这些年来，特别是在菲利普·阿里埃斯和路易-万桑·托马相继去世后，我在法国担当这方面的所谓“专家”的角色，专业已经超出了我所熟悉的历史领域（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在我看来是有意义的）。结果，除了教学和缓解痛苦治疗机构的报告会议外，我还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如关于捐献器官的研讨会，关于新生儿突然死亡的研讨会，在塞维利亚举行的关于新公墓的大会；与此同时，还参加惯常的活动：巴黎大区的一个省的教区周，尼姆的共济会支部，勃艮第的新世俗葬礼会议，更不要说与拉康派的精神分析学者们关于举丧工作的饶有兴趣的争论。此外，蒙特利尔当代艺术博物馆请我解读一个拉美摄影师塞拉诺拍摄的停尸房的挑衅性主题的图片，而巴黎网球场博物馆则邀请我揭示一幅让-彼埃尔·雷诺的冰冷的抽象构图的秘密。列举上面有些离奇的事儿（如果不考虑到主题的话）目的并不在于说明

我的价值,而是为了说明一个许多问题清单的提出,有时提出的目标是相互矛盾的,即使总体上围绕几个相互关联的题目:寻找死的新仪式,临终病人的关爱,也包括对幸存者的关怀(如果这样称呼他们),迄今为止,他们是被弃之不顾的……在一个恢复怀旧与杀人暴力重新猖獗相结合的社会里,还谈得上什么后世或简单地说什么希望?

这里有许多问题需要思考,即使发言人到处都应该同意他并不掌握什么处方,更不用说解决办法了。面对这些新情况,我将其组织在三个主题周围,也意识到这可能过于简单化了,但我的想法是不要掩盖矛盾,这些主题是:强化、怜悯和逃避。

强化?如果我们采纳在我的书中所确定的基本途径,从最基本的情况到面对死亡最复杂的表现,人口因素立即将我们引向一个矛盾的结论,对四分之一世纪前所勾画的情况造成了威胁。不是说总趋势已经翻转了:从一个10年到另一个10年,医疗技术的进步,在最发达国家中,诞生时的预期寿命使得进展持续:在不止一个地方,妇女的预期寿命越过了80岁的门槛;男子的寿命紧跟,保持一定的差距,我们每年都多争取到了一个季度!超过80岁或90岁年龄段的人数在增加。百岁老人不再是值得称道的例外了。最年长的法国人让娜·卡尔芒死于110岁只是暂时的记录。对于第三个千年头几十年的展望告诉我们将有更多的百岁老人出现。

相反,苏联和一些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提供的例子是,同一种制度解构相连的危机导致了预期寿命的明显后退,这是同医疗体系的解体、营养不良或酗酒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由此看到了几乎就在自己的家门口,有可能发生与经济、社会甚至文化相连的显著倒退。我们的西方社会难道会像有些人所说的一定能免受这种倒退之苦吗?在危机的气氛中,人们更加注意到在那些没有社会保障的被排斥者的天地里,面对死亡的不平等更加扩大了。法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理所当然地注意向这些边缘群体提供最低的保障,而美国在对待这个问题时,所处的社会对比更为尖锐,保持了更有选择性的关怀的传统。

1999年5月,研究学者们为纪念经济学家保尔·拜罗克而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上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意见:一方面是“弗雷斯特派”,他们坚信对20世纪大



部分人类“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启示录式的解读,另一方面是乐观自由派,他们不仅指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而且在 20 世纪预期寿命的增加较整个人类历史的情况“翻了一番”,第三世界也没有被排除在外,预期寿命由 35 岁提高到 65 岁(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茨这样说)。弗莱特教授在闭会时说:“老龄人更多了,活得更长了,特别是活得更好了。”但这不是讨论会的一致意见。在报道这一会议消息的同一期《世界报》上,刊载了彼埃尔·乔治的一篇讽刺短文:“在毁坏我们的地球的同时踏上月球,工作减少而失业更多,活得更长而死得更凄凉,走得更快而投入深渊”,将 20 世纪钉上了耻辱柱。

在人口学家的断言和有时鲁莽的预言外,无论在舆论或在反映和制造舆论的媒体中,还是在国家政策方面,对于寿命的延长、不平等和局限性的认识有了变化。而这考虑到——即使是情不自禁地考虑对于非洲和昨天被称之为“第三世界”所遭遇的灾难:饥荒、大规模逃亡——所持的自私的认识。对于劳动人口比例减少而言,老人是否太多了?在西方国家,对于未来数十年的承诺已经陷入社会保险制度的危机中,这引起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当前得宠的新自由派话语在国家的私有化和脱钩中看到了一种解决办法,但这种办法受到了另一些人的质疑,他们认为“社会契约调低”是不能容忍的倒退。由此产生了模棱两可的气氛,但在其中占上风的是忧虑——我们将看到其不同的表现方面。首先是对生命终结问题更为注重——哪个政府没有老龄化政策呢?人们也不能否认在法国或其他国家实行的这一政策有一定程度的有效性,无论是在家庭援助还是更广泛意义上对更多的居民阶层的支持上,都是如此。其次是对畏惧的担心,这一步很快就走过了:人们看到年轻人的畏惧,等待接班,如果畏惧是在社会之外,也令人担忧,人们惊恐地发现有些杀人的儿童、猥亵坟地的少年,如在卡庞特拉,以种族主义思想或是恶意思象,甚至简单地作为游戏所干的那样。最后,更为模糊不清的是老人的畏惧,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他们的退休受到威胁,而且还面临孤独和暴力。但是还有对光辉的 30 年中的致富阶层有时公开表露的仇视的目光,其实这些一时繁荣的受惠者并一定能保持其地位。这种前景给临终提供了怎样的形象呢?在 1999 年,法国的一个电视节目以吸引人的“长命百岁”为题,提供了不由自主地带着挖苦色彩的画面,表现的其实是令人伤心的百岁老人的形象,这

些老人实际上已经经过了挑选，节目将他们与诊所设在纽约的专科医生联系起来，而这些医生的专业是通过先进复杂的技术保证一群由王公贵族、名门富豪组成的富有顾客的长寿。与 20 世纪 60 年代在他们的低温冷冻箱内等待有朝一日被唤醒的美国巨富相比，这无疑是不可怀疑的进步，但他们仍然存在着幻想。

从个人种种畏惧的综合转变成集体畏惧的不同面孔是轻而易举的。与人口和医学统计数字的表格提供的因素相联系的，是出现了新的疾病，令人忧虑地否定了昨天已经胜利或胜利在望的梦想。在 25 年前，我们所提到的军团病在有些人看来是一种奇怪现象，虽然已经有人了解到在非洲的偏僻地区或其他地区出现了不能确定的病毒感染，看到了这是一种报警的信号。艾滋病从非洲到欧洲和美国急速传播，发生了弱化的效应，但又因为在非洲、拉丁美洲和远东医疗预防体系的脆弱或根本不存在而使得情况严重了，成为今天造成死亡的十大原因之一。艾滋病如果算不上是鼠疫类的大传染病的继续，但至少也是梅毒一类的感染，并由其性质而产生过错和受到诅咒的想法。在我们这些国家，艾滋病最初危及同性恋者和吸毒者，在集体的潜意识中被看做对肉体堕落或自外于社会的惩罚。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大家意识到艾滋病在所有的阶层、在不被保护的领域中大规模传播。于是艾滋病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人自危，压制和害怕替代了几十年的性解放，等待确实有效的治疗。每一个时期都以自己的方式处理或承受畏惧：如果说艾滋病在我们的社会里激发了团结互助和相互理解的运动，拉伯雷用以对待他的梅毒患者，然后又为伏尔泰等人所使用的嘲讽武器今天似乎已经不能再发挥作用了。

我们的时代是认真的：一种老的灾难和一种诸如艾滋病的新灾难都进入最含混的畏惧对象之列，虽然我们不直接受害，但其结果在最近几十年中变得日益沉重了。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可以援引那位以勉强的幽默指出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与“广岛情结”安然相处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学家的言论，虽然引用不等于同意他的意见。不可思议的是，随着冷战和两大阵营对抗的结束，在理论上本来应当解除了悲剧的假设（条件是被大国俱乐部排除的国家也“遵纪守法”），核危险通过切尔诺贝利的灾难换上了一副新面孔。人们谈论切尔诺贝利的全封闭石棺，这是不可靠的保护，就像大家谈论波罗的海和白



海的核潜艇坟场,不但不能给予安全感,这些隐喻还说明在那里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也在我们的大门口,如同环保运动所揭露的。替代核战争带来的人类末日的恐惧的,是怀疑一切,不仅怀疑民用的核能,也涉及科学进步的最前沿。只举一例,基因操作令人不安,无论是涉及农业食品领域还是人类基因组,都是如此。疯牛病在未知的祸害和自然经济受损的交汇点上,为这些不安提供了基础,并在欧洲激起了一种新的恐惧。在充满信心,甚至充满欣喜的年月,如在最初的心脏移植的时候那样,任何冒失的事情都被允许,接着而来的则是寒战的倒退,而进步却没有停止。在法国,受感染的血浆丑闻不仅反映了一个过程中的意外问题,也说明了这种感知。对于日益增多的拒绝捐赠器官的现象不能被看做对这个丑闻的简单反应。将个体和家庭的这种退缩看成为自私自利就太简单了,因为退缩表示与躯体和躯体完整的新关系。启蒙世纪厌恶外露的死亡和匆忙的葬礼,而我们的时代则在最近几十年在更多地火化和对死后坚持身体的完整之间犹豫徘徊。

这个文明对前途忧虑重重,又摆脱不了过去,人们以为已经排除、至少是隐藏的过去的死亡形象,以年轻的面貌卷土重来。政治上的大变动,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部爆炸无疑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危机一起,坠入了并不久远的过去,发现了古拉格群岛的世界。而在另一方面,人们已经看到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忧虑的大规模回潮,回顾消灭犹太人的计划 Shoah。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形象加深了的集体的悔恨,也波及了这次大战的其他阶段,如法国的维希政权,似乎是因冷战年代而拖延的丧礼的滞后表示。

种族灭绝的概念,包括屠杀犹太人的概念从过去脱颖而出,提供了模式,获得了合法的权利:虽然有时发生滥用概念的情况(如谈到 1793 年“法国人之间的种族灭绝”),却符合昭然若揭的现实。人们害怕接受各个时代以为所面对的残酷事实都是未见的或未闻的诱惑。欧洲国家在这半个世纪中在本土没有战争不能使人忘怀在越南、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战争中犯下的暴行。

但是,从卢旺达到苏丹,更不必说东帝汶,从那里传来当代种族灭绝的骇人听闻的图像。在以种族清洗为特征的巴尔干纷争中,从波斯尼亚到科索沃,在我们的门前发生的不是大屠杀,而是颇为相像的东西:超出了—个世纪以前的种

族内部屠杀历史的回归,我们新近获得的经验教训更为丰富。对于科索沃的惨剧进行思考,我们面对三种图像,或是三个相互交错的难忍的死亡层次,这是非常古老的“文明之外”的屠杀、强奸、群众流离失所的图景,是19世纪末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家(帕麦斯顿或迪斯累里)所不希望看到的;而这种景象为独裁政权所改进,并应用于现实,它们将其做法依据我们这个世纪的野蛮经验进行理论化;在所有一切之上飞越而过(人们不再敢说是悄悄而过)的是装载着编好程序的死亡的飞机,装备了最先进的现代技术,尽管不是没有破绽的。

在这个混乱的舞台上,死的集体表现的历史受到了充分的质疑。我们不断提到的关于死的禁忌的“最新”提法是“零死亡选择”,在这个提法的背后是世界新秩序的极端虚伪的鼓吹者。确实,零死亡对他们的阵营是合适的。而在对面,无论是罪恶的还是无辜的,施刑者还是受害者,包括军人和平民,从伊拉克到科索沃或塞尔维亚,为了法律的胜利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是无所谓的。

一个处于防御地位的社会,一个自私地只考虑自身存活的社会,必然在自下而上的态度、行为中产生一种为他人的死辩护的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还以为可以以世界各地废除死刑的进步结束我们的考察。在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法国取消了极刑,似乎是对自己虽然不是首倡者的十字军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我们那时已经知道这一启蒙思想的明显胜利是脆弱的,因为从1976年起,美国各州相继恢复了死刑,并且有时任意使用。我们在自己的古老的欧洲是否能免于这种诱惑呢?在那里,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拥有枪支,监狱里关押的人数是居民的1%。我们不能很有把握地提出这个问题,最好也不要过分依赖民意调查了解有多少法国人赞成恢复死刑(可能有62%)。害怕是暴力的后果,而暴力又是危机和排斥的后果,害怕助长排斥移民、边缘分子和年轻人的潮流。在走完了这一段路以后,读者有理由怀疑我们抹黑了这幅图画,以防止落入任何时代难免的话语贬值的平庸状态。这可能是缺乏距离所造成的:塞巴斯蒂安·梅尔西埃(我们没有效仿他的奢望)在旧制度末期曾经提出了他的《巴黎场景》,完全沉浸在病态的情状中。

需要考虑各方面的情况。从同情出发(不仅是更为“现代”的团结一致出发)看待以后的发展,我希望反映集体意识的明显提高及其后果,即使是有限的。



最明显的限制——对此不必赘述——仍然是为了保持对死的禁忌的沉重压力,遵循连续性的规则:城市化的压力、居民的混合、家庭的缩小、死亡的医疗化(大部分人死在医院),所有这些因素的分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但是,人们对待这些问题的思想变了,反映出一种急迫的感觉。医学的研究和实践继续前进,尽管没有革命性的突破。虽然艾滋病没有找到根治的药物,各种形式的癌症由于预防和新的治疗方法而有所退缩,至少治愈率增加了。然而,容易激动(有时愤怒)的舆论的动员有一些特点。在今天,引起非议的死亡可能是新生儿的突然死亡:命运的不公、医学的无能说明了公众强烈的关注,尽管记录的情况不多。对于遗传性疾病也是如此,因为这些病症涉及年轻人,发展快,保留着受诅咒的分量。因此才有媒体宣传的团结友爱运动的成就,金枪鱼电视台是一个例子。然而,虽然年轻人的死——无论是突然的还是预期的——引起纷纷响应的思考,最引起注意的仍然是临终病人,而老年人占了其中的大多数。

跟踪“死亡历程”(death trip),从临终到墓地,也到后世,而不追求复杂化,这就要面对更为经常提到的姿态、实践的解构和对新的仪式的追求。新仪式只是更为复杂的格式化表现。正是在这个领域产生了最敏感的变化,对这些变化有肯定的态度,也有否定的态度。

无论在城市和剩下的农村,在医院送终已经普及的同时,昨天的有些剧烈冲突似乎减少了,如对医疗权力的攻击和对全力治疗的谴责弱化了。医生们也有所前进,向新的做法,如辅助治疗单位开放,虽然动静不大。但是对这一印象应做些补充,就是信心可能被一件丑闻所动摇,如在法国,为受污染的血浆事件所动摇,然而,就这方面而言,“归罪于政治”至少已部分代替了医生整体受到非议的状况。在拒绝捐献器官方面,也是如此,与其说是对医生的敌视姿态,倒不如说是看到了与躯体的新关系,是家庭情感的变化。与这些新的趋势相联系的是医生集体和官方机构对拒绝疼痛的关注,而在昨天,疼痛还被有些人看做为与疾病并行的伴侣。即使禁毒政策毫不妥协地开展(至少在法国是如此),过去认为是对人类弱点让步的医用吗啡已经不再使人害怕,也不再使人感到可耻。

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如果以库布勒·罗斯为参照,是

从1965年起)为临终阶段人道化所进行的战斗迈出的一步,也即将对话者的尊严归还给垂死者,使用所谓的“nursing”(护理)办法以耐心的照顾与心理问题结合,以“陪伴”结合辅助治疗的步骤,同时避免无益的强加于人的做法。

正是在这些基础上组织起了附属于接待临终病人的医院结构的辅助治疗中心,倡议首先是零星的(如犹太城的保尔-布罗斯医院)。一些结合了医生、男女护士、治疗者和自愿者的小组建立起来了,确定了一套专门的训练办法。当前(1999年)在法国,国家将发展这些服务机构列入了官方政策,希望能逐步克服迄今为止的落后状况,因为今天只建立了54个单位,所占的病床数微不足道。无须隐瞒,这个政策受到的欢迎不是没有保留的,也不是没有其他打算的,这种情况不限于医生。简而言之,可以认为这种做法触动了一种医学传统,不习惯于(更多是没有受到过训练)对被认为超出了自己业务范围进行精神投入,另一方面,这必然会要求对安乐死表明态度,而医学界对此是强烈保留的,其目的是提供没有痛苦的死,而不是引起死亡。而在医院的实践中,思想的交锋,经常是论战式的,安乐死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很少有医生挤破沉默的脓疮,说明曾经在病人的要求下这样做过,承认做过安乐死的医护人员要多一些。不过,对于这样一个产生过害怕的问题,英国、荷兰和法国的报界都报道过一个过分热心的护士或杀人的护士的故事。“right to die”(死亡权)或是我们在法国所说的“在尊严中”死去,也就是当明确表达了意愿后的要求,显然仍旧是少数唯理派精英们的专利。

在日常生活中,最后阶段经常是在医院的环境中发生的,面临着传统仪式逐渐被破坏的问题。最近的读本,如克利斯蒂安·比佑神甫的读本——由一个专司此职的指导神甫介绍今天的基督徒之死的做法——突出之处是注意以灵活的和理解的态度适应多宗教和多种族居民的要求,特别注意这些居民中的大多数已经不习惯于传统的姿态,更不要说已经脱离了基督教文化了。这本书肯定家庭的在场,只要有可能做到时,也对支持家庭的服丧工作和帮助垂死者给予同样重要的地位,对死者的帮助根据现代基督教末世学精神以怜悯和争取复活为特征。

最能抓住在新和旧之间动摇不定态度的场合是丧葬,从中看到传统姿态的



毁灭和人们不敢称之为新的仪式的雏形。在法国,70%的死亡在医院发生的情况产生了一种需要,需要在那里建立一个地方,谈不上是为了哀思,至少也是一个有一定尊严的上路的场所,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因此,1996年在巴黎附近的加尔什镇,亨利-普恩加来医院根据一批医生的要求建立“告别室”的试验性举动具有特别的意义。告别室请了意大利艺术家埃托尔·斯帕莱蒂设计,得到了最高文化当局和法国基金会的支持。这就是说,这一行动是示范性的,目标是使得死亡人性化,如果说名称有些中性(还有什么更好的名称呢?),这个长方柱形建筑蓄意的简约、普遍的基本象征意义,形成了一个丧礼建筑可能具有的形式的认识。实际上,在当前的情况下,家庭住房大大失去了集会的作用,15年前还有70%的法国人认同的宗教出殡已经衰落,既是因为缺乏主持人,也因为集体要求的减少,也就可以理解公私丧葬企业中的殡仪大厅迅速发展的原因了。法国是否在向英美世界学习呢?殡仪大厅的做法在起初颇为艰难(从1962年到1975年只建了35座),今天在偏僻的区一级都已遍地开花了。这一成就的关键是机制上的。丧葬的私有化和市政府将这项工作交给一个公司的行动说明了遍地开花的原因。如果丧葬业情况良好,其基础是仍占多数的总殡仪馆与咄咄逼人的自由派代表(如勒克莱尔连锁集团)的竞争,法国的历史遗产中有关于对丧葬相对投入的方面。法国如同其他欧洲国家,反对美国式的尸体深度防腐处理,尸体的化妆简单。过去的盛大葬礼又成了什么样子呢?我们将在下文关于死亡的想像中提到有时难以预料的现代版,但是,对于普通死者,送葬行列和与此相辅而成的社会交往的衰落已经不可挽回。

1988年在塞维利亚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大的会议,对公墓的当前状况进行经济的、人口的和城市建设方面的探讨。法国的公墓面对的是可以使用的土地缺乏,需要寻求空间,只能分散到新的或景色宜人,或无此特色的地方,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大理石的黑潮冲击下,上世纪的公墓景色正在恶化。我们所提出的补充书目却说明了关于死者墓地的文献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在这些废墟的景致中,私有化的丧葬设施及其辅助物的复兴做得不好,但如果说不看到新的词语、姿态和会见的追求,也是不公道的。一些基督徒在这里组织一个没有教士参加的宗教纪念活动,在那里,一些世俗人对革新的公民仪式进行思考。又该如何看

待讣告呢？如《世界报》今天所发布的讣告，几乎淹没在各种感情表示的海洋中：向祖母赠送一只挂钟，朋友的生日，对牺牲者和英雄的思念等。经常还能看到不得体的、个性化的通告，如人们所说的，脱离了昨天约定俗成的格式。这里提出的既是见证，也是控诉，并以自己的方式说明这是沉默的常规，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刻板话语都无法抗拒的。

但是，什么是这一新话语的实质呢？死的当今的想像，如果不坚持观念上的表面分歧，是有一些倾向可查的：从教条和定见的加速毁灭中，产生出一些意识形态上的“拼凑”，每一种都试图寻找自己的道路，提出的东西除了后世的图像，还有对丧事的强调，而对丧事的强调又与可以称之为“死者的回归”相结合。这是一种为寻求平静的新的共居，有时却失落在以“忏悔”形式表现的追思的回归造成的集体压力之下，但却能够围绕标志性的图景制造未曾见过的象征物。

在对想像中的死亡的新领地进行全面的认识之前，颇有意义的事情是比较我们在 20 年前，即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列出的表格和 1994 年 5 月应《世界报》和《生活》要求所进行的“关于法国人的信仰”的民意调查。这次调查至少提供了与法国有关的一些情况。

这些情况是严峻的：67%的法国人今天自称信奉天主教，而在 10 年以前是 81%；对上帝的信仰情况比较稳定，从 66%降到 61%。但是，我们提到的后世变得越来越不准确了：肯定有后世的意见无疑广泛传播，甚至还有进展，因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肯定的回答约为一半，而现在的肯定回答为 60%，而否定其存在的从 53%退到了 25%。但是，实际上，取得最大进展的是那个回答说“有什么东西，但我不知道是什么”的人群。那些敢于明确提到的人群只占少数。昨天渐趋消失的（占 25%）的地狱回升到 35%，暂时赎罪的栖息地炼狱只有 35%的人提到（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只有 44%声称是天主教徒，而有 71%的人承认是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

将法国人的集体灵魂图景推论到其他西方文明国家，显然是不谨慎的。在不同的欧洲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很遗憾地不够精确，但其对后世信仰的比例都更高，无论在南欧的天主教国家还是北欧的新教国家都是如此。不过其总的倾向超出了法国的特征，表明教会现有理论的后退和非基督教化的突出状况。使



得这个调查的评论者感到意外的,其实也是模棱两可的(如对后世信仰的恢复和地狱的重振),不在于这些情况,而在于所采取的形式。既不是理性思想的发展,也不是回到教会的旗帜下,一种含混的新的非理性思想通过个体的意识形态拼凑传达出来(在教派的范畴中,有时是集体的),采取的形式是各种学说的混合体,经常来自基督教的遗产(但排除了罪孽的观念),也来自其他的体系(11%参加调查的法国人相信转世)。如果人们不再相信科学,39%的法国人相信外星人,71%的法国人相信思想的传递,还有37%的人相信死者与活人交流。这些杂乱的思想既适用于基督徒,也适用于无信仰者:11%的法国人(有人会粗暴地说是最后一小撮)是传统的做圣事者,他们相信天堂—炼狱—地狱的三联体,但是大多数天主教徒相信活人和死者的交流,还有许多人认为基督教末世学将重点放在复活的允诺上意味着彻底排斥了扎根于及时赎罪或永久惩罚的传统战略。

“我们要警惕形象”——埃切加赖大主教的警告驱散了传统中炽热的炼狱形象,将其改变为一种暂时受苦受难的状况,地狱充其量成了一种拒绝承认上帝的人地位的假设……我通过当代的报刊和媒体中的形象对已渐趋消失的炼狱的表现进行调查。人们在玩弄这种表现。我多少有些惊讶地重新看到了本书第一版插画中链条锁住的忏悔女人的形象,是一本格调不高的杂志封面上鼓励施暴受虐的诱人模特……然而,这个汇集了各种苦难和希望的集成地作为生者悼念死者的地方,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与更不自信的唯理派非信徒相比,教会的负责人更为担心的是使得转世信仰广为传播的“东方式”宗教成分的吸引力(其实已在大致上吸收了),所谓的转世就是相信有第二次生命,这比当今关于复活的基督教末世学要轻松一些。

在对后世的表现中显著减少负罪感并不意味着我们当代人理顺了活人和死者的关系,如同有些人所说的,将他们的丧事当做“服丧工作”。我们注意到有些心理分析界对生者与死者的关心,如让·阿鲁克在他所著的《干尸时代丧事的情色》,对弗洛伊德的服丧工作概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而提出另外一种受到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启发的做法,使得人们与“围绕我们的象牙色形象”保持亲近。你能说这是隐喻或干脆直接有所指了?这是我们当代人不确定诉求的一个例子。心理分析家和教士,正如我们从克利斯蒂安·比佑的论文出发所提到的,

这两种人至少在一点上是共同的：第一对象是生者的服丧。于是开创了一个阶段，攀登了重新发现死的征程中的一个阶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怀着怜悯之心关心垂死者的最后过程后，有些人很想探索这个“life after life”的问题，而这正是穆迪“博士”在 1976 年向美国公众所揭示的，是女博士库布勒·罗斯在她的职业生涯终结时所出让的，而又为路易·万桑·托马有保留地和严谨地写入他最近的著作中的。因此，在上帝死后我们处于十字路口，如果允许我简单化，是在安德列·塞拉诺的照片所表现的比真形更大的暴露无遗的停尸房形象和让·彼埃尔·雷诺这样的创作者通过砌在他的衣冠冢或他的抽象构图瓷砖的洁白颜色所表现的探秘途径之间摇摆不定。雷诺的那些作为纪念人们的可见痕迹的大而无当的吉祥花瓶，从柏林到北京到处展出，或是在以色列做成几百个复制品。但是也有人对于花瓶所传递的信息（或秘密）持怀疑的态度。

一般人（其实也不那么简单）需要依赖强有力的载体（不敢说就是活着的）来对最后的终局进行思索。在 20 年前，我们可以勾勒出基于纪念死亡的世俗形式的后退的结论。我们已经指出了对许多大屠杀挥之不去的回顾在纽约和以色列引起的围绕着屠杀犹太人的纪念活动，而柏林一直在考虑以最适当的方式利用城市中心用于这个目的的宽阔广场，在各种用于教育新一代的形式之间摇摆不定。

这种活动的启动使我惊奇的最特殊的例子，是匈牙利的个人或集体“重新安葬”悲惨历史时期对死难者的当前政策。在这类国家，过去讲的是“恢复名誉”，但这种提法就历史而言在今天带有不利的影响。何况在实际上，1995 年在布达佩斯召开的讨论会对于庄严地给予这些死难者不仅一个纪念仪式，而且还要给予一个新的墓地的这种集体做法进行了分析。我们从 1989 年起就注视其进展，那一年纪念了被卡达尔处决的 1955 年革命的烈士；从 1989 年到 1991 年保守派执政时期，纪念了与拉科西和卡达尔政权有关的政治死难者，如在流亡中死去的明曾蒂红衣主教；1991 年至 1994 年间，涉及与霍尔蒂政权（1919—1944）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各种死亡人士或群体，这里面有反共的抵抗者，1945 年抵抗红军的牺牲者，也包括了霍尔蒂摄政本人在内，他死于流亡葡萄牙期间，和他的妻子及儿子一起重新安葬！多么奇怪的时间回顾，研究者们告诉我



们这是继承了马扎尔人的古老传统。在 1870 年和 20 世纪头 10 年,可以找到同样的做法,纪念 1848 年的英雄巴迪哈尼公爵和科苏特,还有 18 世纪抵抗奥地利的英雄拉科西伯爵;匈牙利共党政权也以同样的方式纪念拉兹罗·拉伊克、M.卡罗伊和贝拉·巴托克。一次得到强大支持的调查雄心勃勃地要到西伯利亚墓地找回 1848 年后被流放到沙皇的“古拉格群岛”的裴多菲的遗骨,但调查旋即收场,因为由 DNA 测定的尸骨是女性的……

这种民族的传统是否是关切集体和解和融洽的愿望呢?匈牙利研究人员承认近年来参加仪式的公众严格地说是不同的。但是他们在听到我说明贝当元帅的遗体并没有被移到杜奥蒙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激战,贝当成为英雄的地方,建有军人陵墓——译注]的时候,显得很惊奇。

我之所以注意到匈牙利的情况,是因为这是在更为宽广的潮流中,在这里体现为和解,在别处体现为忏悔,历史、纪念、逝去的伟人和集体回来打扰活着的人。这显然也伴随着问题的个人化。随着斯大林或佛朗哥的死,我们的感觉是一页历史翻过去了,就是个人崇拜的一页,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是传统的英雄化(如古巴为革命英雄的最后典范切·格瓦拉举行的仪式是最近的例子)。

但是怎样看待弗朗索瓦·密特朗向我们提供的思考题材呢?怎样看待他自己准备的死亡,采取对他自己的过去蓄意揭露泄密的形式,然后是漫长的最后旅程的阶段,直到几乎是向全国直播的临终,这难道是可能产生一种稍纵即逝的迷信的过程吗?

这个世界的大人物,由于他们的职位或他们的意愿而引起我们的注意,但他们并不是惟一的。我们的表演的和交流的社会推出这个社会的死后的英雄,他们是爱尔维斯·普莱斯利或克罗德·弗朗索瓦,在年轻人(即使他们注定也是要老的)心中,他们是持久崇拜的对象。死的不公正在一些悲剧性的小事中得到了产生一种在规模上出乎意料反应,只要男女英雄能够因为立场或经历而在他的身上集中了特别的同情心。我们想到了戴安娜王妃,她的传记无论有多大的价值,也许不应当引起她所得到的自发的和世俗的宣福礼:“她有模特的身体,特蕾莎修女的胸怀”,贡扎格·圣布里斯这样说。多么幸运的结合!但反过来是什么情况呢?她由于死亡的情形,在英吉利海峡两岸赢得了大众的哭泣。